

中国近现代
科学与
社会丛书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

朱耀垠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丛书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

朱耀垠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学贤

封面设计：林 翌

中国近代科学与社会丛书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
朱耀垠 著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字数 551 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439-1334-8/G·341

定价：38.50元

《科技新书目》492-240

弁 言

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认识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则产生于西方。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大约 400 年左右。不仅从解释层面(事实、定律、理论)和器物技术层面(工艺流程、产品器械、新兴产业)而且从精神层面(思想、方法、规范)和建制层面(自主性的社会确认和体制依托)引进科学,则是大约近 100 年左右的事。

近 400 年左右,尤其是近 100 年左右,中国社会由封建制(或曰传统亚细亚式)到君主立宪(虽然没有成功)和资产阶级共和(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再到社会主义(港、澳、台除外),其间还曾出现过封建复辟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萌动,结构性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最剧烈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与这种罕见的情况相伴随的是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科学在近现代中国十分落后却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民族精神,同时,这种社会环境也给中国的科学确定了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道器、体用、中西、天人、科玄等深层文化争论,政、军、商、学界对于世界格局中中国地位的远虑和近忧,无不与这种现象相联系。充分展示和解释这种独特现象,对于认识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对于从新的角度审视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过程,对于思考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明的未来等问题,都是有意义的。

史学家们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甚丰,而且多少都涉及到了科学。但是在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即 SSS)的国际学术背景中开展的这方面的史学工作尚难

见到。SSS 领域的学者们近几十年的工作,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看法。但是,对科学在中国的社会境遇和历史轨迹的特殊性及其意义的充分关注和系统分析,亦难看到。我们组织这套《中国近现代科学与社会丛书》,就是基于上述认识,力图联系有关学者,在史学家和 SSS 学者们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围绕近现代中国本土特有的科学-社会现象,做一些工作,陆续成书,献给读者。我们期待着,这篇短短的弁言和这个不起眼的丛书名称能够成为引玉之砖,引起更多的正在或者希望理解中国的过去、分析中国的现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的人士对于上述特殊现象的兴趣,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深化中国科学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探索 SSS 理论和方法突破的可能性。

任定成

1998 年 12 月

于北京大学老化学楼

序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

朱耀垠同志的著作《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就要出版了。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反复修改而写成的。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我愿意借为他这部书写一篇短序的机会，就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简单说几句话。

本世纪初期在中国学术界展开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当时颇为热闹，吸引了各个思想流派乃至政治流派的人们参加，论战文章当时就编辑成书。此书已经进入“民国经典”。

但是，这场讨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当时的热闹，而是在于长期的影响。

整个 20 世纪，这场论战在中国不断引起回声。20 年代到 40 年代如此。50 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在新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上，对这场论战又有新的批判和评论；在海外，也有新的探讨。70 年代以后，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学术界对这场论战又重新作了评价，而大陆在这方面的重新探讨，与海外的探讨，通过相互介绍有了交流。这些在朱耀垠同志这本书中，有详细的考察和论述。

一场历史论战，没有沉没在历史文献的海洋里，而是在学术界、思想界三番五次地引起回顾和反思，说明它所涉及的主题有深刻的哲理，是一个常新的主题。人们回顾历史论战，是因为它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引起人们新的思索。

这个主题，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这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思想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问题，当然远不限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这么狭窄了。

近年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内容广泛而丰富，这里

我只想简单提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批判“科学主义”的问题。这样的批判声浪有日渐高涨之势,并且往往同呼唤人文精神的诉求相结合。

呼唤人文精神,很切时要。人文精神的失落,有多方面原因,很值得研究。但是,为什么要设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的精神当作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不正是应该相结合、相得益彰的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意见:科学精神是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是要反对科学在战争中对人类造成的危害吗?那是社会制度的罪恶,不能归咎于科学。是要强调科学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物质资源吗?认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正是对发展问题取科学态度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能靠抑制科学技术,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的发展。是不赞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人文现象吗?尽管不能不同意在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方面的确存在生吞活剥的毛病,但是不应该因噎废食,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概念,始终是社会和人文研究进步的一种推动。总之,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缺乏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足够的理解和重视,而不是多了一个“科学主义”。

我以为,我们应该提倡科学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需要赶上时代,需要在现代科学发展和现代人类发展的基础上赶上时代。否则,就可能成为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渊藪的危险。

我以为,我们应该提倡人文的科学精神。科学的发展,本质上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近代科学的产生,是同人从神学的精神枷锁下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有力的前提和手段。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著作,以《人有人的用处》为书名,探讨人从机械性劳动的奴役下的解放,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的关怀吗?

我曾经对“科学精神”作过这样的概括：在长期的科学发展中形成优良传统的种种科学精神，包括“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反对迷信、反对盲从的精神”，“勇于革新、勇于创新、反对因循、反对守旧的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息、锲而不舍、自甘寂寞、自甘淡泊、不求富贵、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上，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的精神”，“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对于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维护人道、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斗争的精神”。这些不都是洋溢着人文的追求吗？

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而没有理由去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科学主义”。

我们应该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努力提倡和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

李育之

1998年10月1日

目 录

0. 导论 百年大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历史地位、意义和线索····· (1)

0.1 20 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论战····· (1)

0.2 论战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2)

0.3 论战的不断之回声····· (9)

0.4 本书的宗旨和结构····· (11)

1. 时势之所趋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缘起和经过····· (13)

1.1 中西古今之争的延伸····· (13)

1.1.1 洋务派与顽固派之争····· (14)

1.1.2 “中体西用”之辩····· (21)

1.1.3 中西文化大论战····· (29)

1.2 国内矛盾的反映····· (47)

1.2.1 政治革命与伦理革命····· (48)

1.2.2 经济变动与道德变动····· (56)

1.2.3 科学与反科学思潮的较量····· (66)

1.3 西方思潮的影响····· (70)

1.3.1 从“科学万能”到“科学破产”····· (71)

1.3.2 从“欧洲文化危机”到“中国文明救世”····· (91)

1.4 论战的机缘和经过····· (104)

1.4.1 思想界对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普遍关注····· (104)

1.4.2 参战阵营的基本形成····· (107)

1.4.3 论战的基本经过····· (112)

2. 中西文化冲突的哲学省思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基本内容····· (119)

2.1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如何区分	(120)
2.1.1 张君勱和丁文江的不同划界观	(120)
2.1.2 张君勱的支持者的划界观	(124)
2.1.3 丁文江的支持者的划界观	(129)
2.1.4 折衷派的划界观	(133)
2.1.5 陈独秀和瞿秋白的划界思想	(135)
2.2 自然科学对人文世界的效力如何	(139)
2.2.1 科学有无人文价值	(140)
2.2.2 自然科学能否施用于人文世界的所有领域	(144)
2.2.3 科学之人文价值的实现机制如何	(156)
2.3 西方科学文化能否与中国人文文化相融合	(162)
2.3.1 中国传统文化有无人文精神	(163)
2.3.2 西方文明的危机与科学的发达有何相关	(169)
2.3.3 中国文化应如何吸纳西方科学	(174)
3. 余音缭绕	
——从论战结束到 1949 年参战各方思想的发展及论辩	(183)
3.1 玄学派思路的延续和观点的变化	(185)
3.1.1 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划界问题的再思考	(185)
3.1.2 对自然科学的人文功能的新认识	(199)
3.1.3 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新探索	(207)
3.2 科学派思路的延展和观点的发挥	(221)
3.2.1 对科学的人文价值的继续论证	(221)
3.2.2 对中西文化的再评估	(229)
3.2.3 “全盘西化”的文化发展思路	(236)
3.3 唯物史观派的新超越及其失误	(244)
3.3.1 对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反击	(244)
3.3.2 对科学派的新发展的评论	(249)
3.3.3 对早期唯物史观论者的超越	(254)
3.3.4 前进中的失误	(261)

4. 老问题新争议

——50—70年代论战在大陆和海外的新回声 (265)

4.1 大陆学者对论战的再评议 (265)

4.1.1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科学派的新批评 (266)

4.1.2 从前的新儒家学者的自我反省 (270)

4.1.3 对论战评论的新失误 (283)

4.2 玄学派在海外的延伸 (289)

4.2.1 论证人文文化高于科学文化 (292)

4.2.2 比较中西人文主义之优劣 (306)

4.2.3 宣扬儒家人文精神之复兴 (310)

4.3 科学派在海外的衍生 (317)

4.3.1 对科学的人文价值新论 (318)

4.3.2 对西方科学与中国人文思想之冲突的反省 ... (330)

4.3.3 力倡发展科学推进现代化 (334)

5. 新时代再回响

——70年代末以来大陆和海外学者对论战的新评论
..... (340)

5.1 大陆学者的新评论 (340)

5.1.1 对50年代的评价之再评价 (341)

5.1.2 对论战的新超越 (347)

5.1.3 新的争论 (353)

5.2 海外学者的再检讨 (385)

5.2.1 晚一辈保守主义者对论战的新评论 (386)

5.2.2 新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转向 (405)

5.2.3 海外学者对大陆新近思潮的评论 (419)

6. 世纪回眸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之评价 (423)

6.1 科学与人文的沟通 (424)

6.1.1 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何以可能 (425)

6.1.2 科学与人文的联系何以被割裂 (449)

6.1.3 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如何实现	(456)
6.2 中西文化的融合	(470)
6.2.1 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	(471)
6.2.2 中西文化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482)
6.2.3 如何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	(497)
6.3 传统与现代的关联	(502)
6.3.1 传统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503)
6.3.2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联	(515)
6.3.3 关于对新文化运动的重估和对激进主义的 批评	(524)
附录一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参战者简历	(533)
附录二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研究资料索引	(555)
参考文献	(568)
后记	(594)

0. 导论 百年大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历史地位、意义和线索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于1923年。从此往前至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许多大大小小的论战，我们可以视之为“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准备”和“酝酿”^①。自1923年的大论战往后至今又过了七十几年，此间当年论争的问题不断地被人们提及和讨论，关于这场论战的评价也在不断的深化和翻新。可见，“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从酝酿、爆发至论战过后的各种回声和评论，已延续了近一个世纪，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百年大论战”。

0.1 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论战

关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年的许多参战者和后来的众多评论者都曾作过高度评价^②。例如，梁

① 郭湛波在其《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中曾评述说：“过去的‘孔教’、‘文体’、‘政体’、‘东西文化’……思想的论战，都是小的、局部的冲突，没有正式的准备、正式的宣战，所以胜负不易看清，只是大战的准备、大战的酝酿时期；到了1923年大战突然爆发，这次战争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论战，真是战云弥漫，短兵相接；血战数次，以决胜负；这就是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叫做‘科学与玄学’之争”（郭湛波，1935，第319—320页）。

②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对这场论战的意义予以贬损。例如已故的、西方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列文逊(J. R. Levenson)指出，“任何对科学与玄学有兴趣的人不必对此论战多看一眼。”见J.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California: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XM.

位,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从实践方面来看,这场论战有强烈的实践动机,它涉及到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发展的实践主题,因为它所讨论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问题、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关系到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乃至人类实践的取向的重大课题。李泽厚(1930—)曾认为实践动机是这场论战的核心。他说,这场论战的真正核心在于:“现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李泽厚(1986),第60页)这场论战“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是用科学还是用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同前文,第61页)

它的确是一场关于“人生观”的争论,这种人生观的争论又是与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论战中似乎争辩了那么多的科学哲学和宇宙观、认识论问题,但真正的重点和要害并不在那里。

(同前文,第62页)

我认为,李泽厚对这场论战的实践意蕴的分析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战的发起者张君勱在其《人生观》的演讲中对其实践动机作过明确陈述。他说,

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中国今日,正其时矣。

(张君勱(1923a),第38页)

方今中国中竟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同前文,第40页)

对于人生观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性,科学派与玄学派并无根本性的分歧,分歧在于科学派反对玄学派所要求的、脱离科学的、纯主观的人生观,而要求建立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生观,并主张以此作为改造传统文化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切入点。例如,丁文江指出,

玄学家单讲他的本体论,我们决不肯荒废我们宝贵的光阴来攻击他。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他。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甚么社会?……人各有各的良心,又何必有人来“秉烛”,来做“表率”;人人可以拿他的不讲理的人生观来“起而主张之”,安见得孔子、释迦、墨子、耶稣的人生观比他的要高明?何况是非真伪是无标准的呢?……这种社会可以一日居吗?

(丁文江(1923a),第52页)

丁文江援引胡适在《五十年来世界之哲学》一文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其自己要求将科学运用于人生观的态度: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就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同前文,第59页)

唯物史观派认为,科学派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并不彻底,因为科学派只是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观中来;它并未把社会科学,尤其是没有把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唯物史观应用到人生观中来。而事实上,只有借助社会科学和唯物史观才能揭露各种非科学的人生观的荒谬性。陈独秀认为,胡适只说明了科学的

哲学的人，不能不知道的。(罗志希(1924 自序)，第 1 页)

而对于科学和人生观的本质的探讨又必然引发关于科学规律的本质问题，亦即因果律与自然意志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这是这场论战所涉及到的最根本的理论问题。倘若这一问题解决不好，提倡科学也终将是徒劳的，诚如陈独秀所言，“离开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陈独秀(1923b)，第 32 页)对于这一本体论问题在这场论战中的重要性，有许多人作过评论。例如，张君勱曾评论说，

此二十万言之争论，科学非科学也，形上非形上也，人生为科学所能解决与不能解决也，有因与无因也，物质与精神也，若去其外壳，而穷其精核，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由意志问题是矣！(张君勱(1923d)，参见吕希晨和陈莹(编)(1995)，第 99 页)

瞿秋白也曾评论说，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瞿秋白(1923. 11. 24)，第 294 页)

这场论战的理论动机，张君勱曾回忆说，对于科学的本质的探讨在西方哲学界早已有之，而中国思想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却落后于西方。张当年之所以要挑起科学与玄学之争，其理论动机就是想要接过西方哲人的话题，在中国思想界对之展开讨论。其当时的具体意图有三：第一，在各门科学中，

何以天文学，物理学的公例最可靠，生物界的公例比较可靠，而人事界的公例之可靠性最差，假定我们的思想家肯从这方面研究，然后能认识科学之真性质，

公例之真性质。这种问题，西洋也有人提起，但是我感觉他们还没有系统的说明。(张君勱(1934a)，参见吕希晨和陈莹(编)，第107—108页)

第二，自然界为因果性所支配，而人事界则受自由意志的支配，

惟其有自由，所以科学不能发展，惟其是因果，所以科学的功夫能做。要知道康德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其他与康德抱大同小异意见的，也不少，我那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拿人家的老话，重新说了一遍，实在也不是我的创见。(同前文，第108页)

第三，反思科学，就不能不涉及其前提：人类何以有知识？何以自然界中因果关系能支配一切，而人事界中不能？这种问题在西方科学发达的国家讨论已久。张君勱说，

以上三点，是我提出人生观问题的时候同时联想的三件事，想从这方面起，可以使我们的思想界有一种目标，大家可以向前进行，或者我们的思想史上，可以开一个新局面，换句话说，我们不单接受西洋科学中之现成结果，同时，我们须能够对于科学本身，或者说对于科学的前提，加以思考加以批评。(同前文，第108—109页)

正因为这场论战涉及到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所以，这场论战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它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此，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肯定的评价。例如，美国学者夏绿蒂·弗思(Charlotte Furth)指出，

科学与玄学的这场论战，表明中国第一次正式企图